

隐蔽战线留下一座座历史丰碑

□郝铁川 章 洁

不同的战线，共同的信仰。隐蔽战线的革命前辈生前大都默默无闻，却为共和国留下了一座座历史丰碑。

历时三代人找到革命真理

被誉为“一个人能顶几个师”的熊向晖，年轻时通过共产党人的所作所为，逐渐感受到一股进步的力量。即便那时他连长征都不一定知道，却受到这股力量的感召而向往革命，拼了命地要去找共产党。这就是追求进步、追求信仰。

我的祖父李大钊，是河北省乐亭县人。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也是一位著名学者。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祖父虽然早早地就走了，但留下了丰富的革命遗产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他树立的清正勤谨的家风延续了近百年，传承了几代人。我的父辈都继承了祖父留下来的好家风。我父亲李葆华，曾长期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逝世前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兼党委书记，一生非常清廉，克己奉公，生活节俭。我们第三代的兄弟姐妹中，没有一个是“大款”，大家都以艰苦朴素为荣。

祖父的遗产仅1块大洋。1927年4月28日，祖父李大钊英勇就义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对于他，我是从书中了解的。虽然从未谋面，但我通过文字与祖父相遇了。

祖父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曾祖父便去世了，由他爷爷一手抚养长大。祖父的爷爷非常重视教育。祖父从五六岁便入私塾，到后来去日本留学，他前前后后一共上了18年学。在那个年代，能上18年学的非常难得。严厉的家教，长期的求学，使祖父从小便树立了致力于民族解放事业的远大志向。

留学回国后，学养深厚的祖父担任了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那时他的月工资是120块大洋。再往后，他担任北大教授，月工资涨到200块大洋，加上他在别的大学兼课，每月收入至少有250至300块大洋。

按说，他的收入已经不低了，但因为他把自己工资的很大一部分用在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建党的事业上，再加上经常慷慨帮助别人，日子常常过得很紧张。

从事党的秘密情报交通工作、被称为革命“红色血脉”建立者的吴德峰，即使在遭受不公正待遇时期，也谆谆教诲子女：“我们家在中华民族存亡危急之际，从‘维新变法’经过‘辛亥革命’，历时三代人最后才找到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革命真理。”这是他一生的坚定革命信仰和信念。

我们党第一部电台发报员、红色密码通讯第一人张沈川，始终坚信共产党的事业是正义的，是真正为国为民求解放的。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默默奉献以及不图名利、无怨无悔，始终装在他的脑子里。

张沈川曾三次遭到国民党通缉、三次生重病，还坐了六年半的国民党大牢。1925年患急性赤痢，1930年患严重伤寒加肺结核，特科领导看后都要求为他准备后事了。1949年，他又先后三次行胸廓改形术，割去左胸八根肋骨、左肺压缩，不能呼吸，实际已成了个残疾人。但是，这一切都没能动摇他对党的事业的信念，没有摧毁他为民国奋斗的的决心和信心。

被傅作义称为自己“左膀右臂”的地下党员闫又文，直到去世前也没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他从干革命的第一天起就带着牺牲精神，从来不求名利。

在最危险时期帮助了党

杨登瀛原名叫鲍君甫，辛亥革命前后受革命潮流影响去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时读过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回国后即参加五四运动。因其有着广泛的社会关系，内心又同情革命，逐渐为特科工作。

1928年，经陈立夫、张道藩推荐，蒋介石任命杨登瀛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由此，鲍君甫正式化名杨登瀛，开始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活跃于上海滩。

在周恩来、陈赓的直接领导下，杨登瀛不仅为我们党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而且参与营救任弼时、关向应、彭湃、杨殷等同志的行动，协助侦察叛徒白鑫、戴冰石、陈蔚年、黄第洪的行踪，以及报告山东省委书记叛变等情报。这是发展使用非党情报员的一个成功范例。

1931年4月，杨登瀛被捕入狱，遭到国民党的恩威兼施，却始终未供出共产党的任何情况。1949年，当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时，杨登瀛在南京街头靠摆纸烟摊为生。1969年，杨登瀛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对子女说：“我不是特务，也不是什么内奸，周恩来是知道我的。”

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在弥留之际，召见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告诉了他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有杨登瀛。周恩来嘱咐：“对这些在我们党最危

险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了！”

杨登瀛在关键时刻没有叛党，源自他坚定的理想信念。他的一生，只有对革命的付出，却别无他求。

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

吴德峰出身于一个显赫的官僚大地主家庭。了解他的人说，别人是因为穷干革命，吴德峰却是带着万贯家财来干革命的。

1927年12月至1928年1月，吴德峰出任中共赣西南和赣北特委书记。1928年春，由于江西省委出现叛徒，他果断地将特委有关人员转移。几经周折后，吴德峰在上海见到聂荣臻，与党组织重新接上了联系。

吴德峰常讲，间谍、间谍，只有“死间”没有“活间”，随时准备为党、为革命牺牲一切直至生命。他在领导西安情报工作时，就将两把长征时用过的手枪放在堂屋正面墙上的佛龛里，一旦遇紧急情况就可取枪自卫。他还与夫人相约，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

甘当无名英雄，是长期在蒋介石身边担任速记员的地下党员沈安娜一生的追求。当时，沈安娜夫妇尽管都有较为体面的工作，但薪水微薄，再加上物价飞涨，只能勉强糊口。当国民党元老推荐她做立法院委员时，虽然这意味着将有很高的收入，但为了能够继续在速记员的位置上为党收集情报，沈安娜毅然婉拒了这一“美差”。

1931年4月24日，党中央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叛变。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获知讯息后，派他的女婿刘杞夫连夜赶到上海，通知了李克农。李克农深知情况危急，立即出门向党中央报警、通知战友转移，以致顾不上跟家人打招呼。

4月27日一早，李克农的妻子像往常一样带着孩子外出买菜。一个好心的邻居跑来说，国民党军警把你家包围了，快跑吧。李夫人不清楚发生了什么情况，也不知道向谁求助，只得带着孩子在街头流浪，晚上就睡在菜市场的石桌上。直到一周后，孩子在街上认出了曾经和爸爸李克农一起工作过的人，这才摆脱了困境。

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儿

中共中央交通局建设和运作的地下交通网络，在第一次国共内战期间（1927年至1936年），不仅完成了繁重的传递运输任务，而且不曾遭到敌方大的破坏，也没有遭受大的人员损失。这与严格的纪律与自律是分不开的。

交通工作创建伊始，吴德峰就领

导制订了《秘密工作条例》：一、不允许发生任何“横向关系”；二、机关所在地，只允许上级了解下级的，下级不允许了解上级、隔级和兄弟机关的；三、不该问的人和事不问，不该看的文件不看，不该传播的不传播；四、坚守岗位，不允许到群众斗争场合，不许照相；五、写过的复写纸、印过的蜡纸和有机密文字的纸屑要及时烧掉。吴德峰还进一步明确，对秘密工作要“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儿女”。

吴德峰不仅严格要求交通局工作人员，而且对自己和家人也严格自律。当时，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同志常常在他家里开会。他总是安排好后就回避，避免发生横向交错关系。他的夫人站岗放哨时，也是不看、不听、不问。

吴德峰夫妇与周恩来联系密切，却从无工作之外的接触。据介绍，吴德峰夫人在上海地下工作期间从未见过邓颖超，还是后来转移到中央苏区时才认识的。

按理说，传奇人物应该有许多故事、许多秘密，但李克农从来不对家人谈论工作上的事情。李克农的孩子们也懂得规矩，不该问的从来不打听。如今，李克农已经走了，他究竟带走了多少故事、多少秘密，成了永远的秘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一大憾事，但这正是隐蔽战线工作的特点。

1942年1月，周恩来规定了建设坚强的、战斗的党组织的几大条件。

例如，要使党员成为隐蔽的、坚强得力的、与群众有联系并善于影响和推动群众的干部；要使党的领导机关有独立领导的能力和自信，不要怕犯错误，要能认识和改正错误，要善于估计情况、运用策略，创造各种各样的工作方法，使党的方针能在每一项实际工作（组织的改编、干部和党员的审查、反奸细的斗争、秘密工作的教育等）中体现出来。

又如，要熟悉各主要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其历史、政策、人物和活动，首先要知道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当局特别是各特务机关的经常情况和紧急措施；要做到凡有群众的地方一定要进去工作，首先要解决的便是进入国民党、三青团、工人团体、学校中的合法组织、农村中的合作社以及一切重要行政机关中去工作，去实现党的抗战、民主、进步的方针。

再如，要善于使上层工作和下层工作相配合，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配合，公开宣传和秘密宣传相配合，党外的联系和党内的联系相配合，但配合不是暴露。

这些规定具有穿越时空的力量，也是对我们党隐蔽战线历史功勋的一个很好注解。

（摘自2019年10月22日《解放日报》）

周恩来妙语巧释科学家压力

□侯 坤

1966年的一天，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钱学森等我国著名的核科学家都参加了此次会议。

周总理首先做了一些背景介绍。当时，我国虽然研制出了核弹，但有的国家却攻击我们“有弹无枪”，意即我国虽然有了核弹，却没有相配套的运载工具。这次会议的目的，便是请钱学森等科学家探讨解决所谓的“有弹无枪”问题。

会上，科学家们集思广益，并与周总理进行了详尽的讨论。周总理听取了科学家们的意见建议后，打电话向毛主席请示。放下电话，周总理说：“毛主席同意我们的方案，并赠给大家十六字指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后来，钱学森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这条十六字指示，我们每次试验都要讲，检查很严格，所以才很少出事故，很少伤亡。当然，也不是说绝对不出事故，因为总有没有认识到的事物。”可见这十六字指示，对科学家们的工作发挥了重要的指导意义。

可在当时，听到周总理传达的指示，在场的科学家陡然觉得肩上的担

子十分沉重。有人甚至倒吸了一口气，许多人都因为这“万无一失”的标准而感到深深的压力。毕竟，核弹的相关科学研究工作难度极大，不确定因素很多，要做到绝对意义上的“万无一失”，是几乎不可能的。

周总理敏锐地察觉到了科学家们的面部表情以及心理变化，他的一席话令在场的科学家们如释重负，思想负担一扫而空。周总理解释说：“什么叫万无一失？把想到的、发现的，都认真解决了，就叫万无一失。没发现的、解决不了的，是吃一堑长一智的问题。打枪还有卡壳的时候呢，别说导弹了。放心吧，只要认真做了，出了问题，领导来负责，我周恩来负责。”

周总理的睿智早就在世界范围内传为美谈。这一次，周总理以敏锐的观察能力，捕捉到了科学家们的心理变化，于是他巧妙地解释了“万无一失”的含义，成功化解了科学家们的压力，堪称又一次经典之语。

（摘自2013年第9期《红广角》，原标题为《周总理巧释科学家压力》）



曾日三：屡建功勋的红军高级指挥员

□谭 畅

曾日三，又名曾日山，是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1904年生于湖南宜章城关镇曾家湾一个读书人家庭。1919年考入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毕业后到宜章第一区高小任教，后任国民党宜章县署督学。

1928年1月，朱德、陈毅领导发动宜章暴动，将宜章县反动上层人物一网打尽。暴动胜利后，曾日三作为正直青年被吸收到县苏维埃政府参加革命工作。同年2月，他参加中国工农革命军，4月，随湘南起义部队到井冈山，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起，曾日三任红4军军部秘书、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参加了保卫井冈山、开辟赣南闽西苏区的斗争。1934年10月，曾日三参加长征，任红5军团政治部主任、代政治委员，率部担任后卫。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后，红5军团改番号为红5

军，曾日三任代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被编入张国焘指挥的左路军并作为前锋部队。他坚决支持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维护红一、四方面军的团结。

1936年10月，曾日三随部西渡黄河，转战甘肃省河西走廊。参与指挥古浪、永昌等战斗。后任西路军政治组织部部长、红9军代政治委员。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他任西路军第三支队政委，率200余人突围，艰苦转战祁连山区。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他要求共产党员起模范带头作用，每一名指战员都要做钢铁战士。

1937年4月27日，曾日三在红柳园子遭国民党军包围，为掩护伤病员和妇女先撤，他率部担负阻击任务，最后落入敌手。面对敌人的屠刀，他大义凛然，高喊“红军万岁”，壮烈牺牲，时年33岁。

（摘自2019年9月17日《人民日报》）

李大钊清廉家风代代传

□李宏塔（李大钊嫡孙）

战的洪流中。

父亲拒绝调新房。我父亲继承了祖父的高尚品质和良好家风，对我们没有什么条条框框的规定，更多的是身体力行，身教重于言教。并且，我父母从小就用父亲的事迹教育我们，要我们严于律己，不断进步。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担任过水利部和水利电力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在水利水电战线上奋斗了12个春秋，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是新中国水利水电事业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父亲经常深入到各个水库视察指导工作，有一次还陪兼任淮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到安徽霍山县的佛子岭水库工地，当时附近没有招待所，两个人干脆睡在一个潮湿的工棚里。大别山区雨特别多，工棚没有防雨措施，漏雨夜两人通宵达旦无法入睡。

1978年，父亲调到中国人民银行主持工作，69岁高龄和生疏的领域，对他来说，显然是巨大的挑战。然而，在银行工作的4年里，父亲经常通宵达旦的工作，规划金融业发展蓝图，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金融业的恢复和改革工作，完成了金融业的拨乱反正，推动了金融体制革新的全面展开，也为成功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作出了杰出贡献。

后来，父亲还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然而这样一位高级干部，家

中却简朴得让人难以置信——老旧的三合板家具、人造革蒙皮的椅子，客厅的沙发坐下就是一个坑。房子是20世纪70年代的建筑。2000年，中央有关部门要为他调新房，他说：“住惯了，年纪也大了，不用调了。”

我的哥哥李青是父亲的长子。哥哥说，他有两件事一直铭记在心。

一件事是，1994年，父亲到杭州开会，时任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到驻地看他，当时在浙江工作的李青也在场。李泽民告诉父亲李青表现很好，父亲马上对李泽民说：“你们对他要严格要求！”

另一件事是，1995年，李青在中央党校培训学习，周末回家看望父亲，一般要骑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当时李青已经50多岁了，骑车一个多小时也挺累的，但父亲并没有因此而照顾李青，父亲从不让他的司机接送李青。

从这些小事和细节，可以看出父亲是怎样严格要求子女的。我们深深地体会到，这是父亲对子女的大爱，是真诚的、严格的爱。

我踏着先辈的脚印往前走。父亲去世后，曾有记者问我：“你父亲给你们留下了多少遗产？”我回答说：“我们不需要什么遗产，李大钊的子孙有精神遗产就足够了。”

其实，从我们几个子女的生活点滴中，就能了解李家的家风。

1987年，我调到安徽省民政厅担

任副厅长，曾先后4次主持分房工作，分房近200套，从未给自己要过一套房子，在担任厅局级干部期间，一直住在一套60平方米的旧房里。按照省里的有关规定，我可以分一套新房。1987年至1992年3次分房我都有机会，但考虑到厅里人多房少，每次我都让给了其他同志。直到1998年最后一次分房，那时我已经担任厅长，想到许多年轻科长住房较差、需要改善，我又一次不顾妻子的埋怨，放弃了最后一次分房机会。

别人可能难以相信，一个厅级干部住的宿舍不到60平方米，没有装修，也没有什么好家具，更没有现代化的电气设备。8平方米过道既是客厅又是餐厅，放一张老式的大方桌，连走路都得侧着身。最时髦的就是一个20世纪80年代作为福利发的三人木制沙发，一半放衣服，一半放书籍。后来，省里按规定主动给我补了一个20平方米的小套间，我的儿子才有了一个自己的空间。

我认为，一个人是否富有，更多地在于精神层面，物质方面并不太重要。

我一生与自行车有着不解之缘，可以说是感情深厚。

上学期间，我一直骑自行车来来回回。后来当兵了，有3年时间不怎么骑自行车。1969年退伍到合肥化工厂当工人，后来进合肥工业大学读书，

1978年任共青团合肥市委副书记、书记，1983年任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1984年任安徽省民政厅副厅长、厅长，我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

任副厅长期间，一天，厅里一位同志看到我步行上班，便问：“你怎么不骑车呀？”我告诉他：“车子放在楼下被偷走了。”

对住，我不讲究，对吃、穿，我也同样不讲究，我不抽烟，不好酒，更不上歌厅、洗脚房。

虽然我家挺节俭的，但我们并没有多少存款。有人会问，钱都到哪里去了？

民政厅机关里的不少人心目中都有数，在每年“送温暖”“献爱心”的名单中，我的名字都是排在最前面——这样的名单，不是以职务高低，而是以捐赠的数额多少排名的。

还有，如果到农村看到“五保户”家的房子漏雨，到福利院看到老人被子太薄，到“低保户”家看到过年包饺子没钱买，我就会想起祖父李大钊救济穷人时的样子，情不自禁地想帮助他们。对我来说，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李家的良好家风，让我们能够心平气和地固守清贫，我们是心甘情愿的，没有任何装潢门面。“革命传统代代传，坚持宗旨为人民。”我经常用这副对联自勉，并以此教育子女，决心把李大钊的良好家风继续传承下去，踏着先辈们的脚印继续往前走。

（摘自2018年第7期《党建》）

